

徐坤小说语言变异的语境分析

陈碧莲, 王炳中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7)

摘要:徐坤小说语言的变异给文学语言注入了活力, 扩大了文学语言的张力。这种文学语言的变异一方面受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是因作家自身的女性、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对徐坤小说语言的“文本外语境”和“文本语境”的解读, 可以探析其小说语言变异产生的独特文学意蕴。

关键词:徐坤; 文学语言; 语言变异; 语境; 文学意蕴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5)06-0066-06

语境是语用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可分为狭义语境与广义语境。“狭义语境既语言语境, 指言语内部环境, 即说话的前言后语、作品的上下文等的关系。广义语境即所谓的非语言语境, 包括社会环境、时代背景、人物的心态、修养、身份背景、话题事实背景以及实际的范围场所、对象等条件”^[1]。在本文中, 为了方便说明, 笔者把小说文本的非语言语境称为“文本外语境”, 语言语境称为“文本语境”。笔者尝试以新生代作家徐坤小说语言变异为例, 解读其小说的“文本外语境”和“文本语境”, 以探析小说语言变异的独特性。

一、徐坤小说语言变异分析

读徐坤的小说, 感受最深的就是其语言的大胆、怪诞。比如:“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全靠我们自己。”(《先锋》)及“一味闭关锁国来死守, 玩小孩过家家哪儿能行? 一不留神还不倾国倾城了?”(《谁给你传球》)等等。前句戏拟了国际歌, 后句又出现了成语“闭关锁国”、“倾国倾城”的化用。这样的话语, 活泼而又沉重, 有血有肉, 让读者在轻松愉快中见其真意。徐坤小说中, 这种超常规的语言现象比比皆是, 正是这种超常规用法, 给语言注入了活力, 扩大了语言的张力, 形成了其鲜明的语言风格。

1. 仿词、仿语的大量出现

在阅读徐坤的小说时, 总会遇到一些熟悉而又陌生的语言, 诸如“国际儒联”、“狗道主义”、“前现代主义”、“何以解酒, 唯有跳舞”、“江山代有学者出, 各领风骚一两年”等, 当我们在语言库中寻找它们原形时分别找到了“国际足联”、“人道主义”、“后现代主义”、“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江山代有人才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在与原形的对比中, 这些语言显示出了超常规性, 即变异性。然而作者是如何构建这些变异的语言的呢? 从修辞手法入手, 我们发现, 这些变异性语言的形成依托的是仿拟辞格的运用。仿拟就是一种“打破言语表达的固定模式和审美定式”^[2]的修辞手法。仿拟辞格在徐坤小说文本中的运用, 主要表现在词、短语、句子上。

收稿日期: 2015-10-12

作者简介: 陈碧莲(1983-), 女, 福建莆田人, 助教, 文学硕士, 主要从事语言学研究。

2. 成语、诗句、故事等的超常引用

徐坤在使用“引用”辞格时,进行了极大的探索,在成语、诗句、故事的超常引用中,形成其小说语言的又一突出变异现象。作为知识分子的徐坤,她的成语、诗句、中外故事的积累是很丰富的,在小说中的大量引用就是表现。在引用成语时,她经常把两个或多个成语不加标点地组合在一起,造成成语组合形态的变异。如

我仍不甘心,一见有马车路过,就用自行车挤它别它,往马身上扔石头子儿朝它脸上扬沙子吐唾沫,直到我气喘吁吁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它也不过打了个响鼻儿抖了抖身上的毛,用一种物我两忘的目光也斜着我。(《呔语》)

徐坤在引用诗句时,常常是将不同出处的诗句连在一起,使句子出现拼贴的变异形态。如《先锋》的一些句子:

例1 去留肝胆两昆仑,我以我血荐轩辕。

例2 梅花欢喜满天雪,浑身是胆雄赳赳。

例3 自古英雄谁无死,我是屁特我怕谁。

例1把谭嗣同的诗句和鲁迅的诗句拼贴在一起,例2把毛泽东的诗句和样板戏的话语拼贴在一起,例3把文天祥的诗句与王朔小说中的话语拼贴在一起。

徐坤小说中还常常间接引用一些诗句以表达内心情感,把诗句融入叙述话语中,成为叙述话语的组合部分,使得其小说语言呈现明显的散文化、诗化倾向,小说语言也出现了不同文学语体的杂糅。如《含情脉脉水悠悠》中一段话:

汽笛这时“呜呜呜”的悠久长鸣,忧郁的,憔悴的,苍远的,幽咽的长鸣。那是船在说话。那是江的祈语。那是上苍在流水山谷间在对她应答。

含情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萍洲。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徐坤小说中常常引用古今中外的一些故事,如《梵歌》、《传灯》中都引用了武则天的故事,《行者妩媚》中引用了唐僧取经的故事,《轮回》中引用了《复活》中的故事等等。然而,作者在引用时,并不是直接引用,常常是篡改故事的本来面貌而间接引用,并附上作者的新意向,从而造成语言变异现象。徐坤小说中故事引用的目的是借古讽今、“借西讽中”(指借西方故事讽刺国内的一些现实),因此,故事常常是以新的面貌被“复活”的。

3. 陌生化的比喻

比喻在徐坤小说文本中频繁出现。徐坤运用比喻具有随意性,其比喻的相似点已经超乎一般的相似框架。因为徐坤的语言本体意识很强,她的语言更加注重的是能指作用。在她超乎相似点的比喻下,其小说形成了丰富的语言变异形态。如:

文坛无非几圈麻,哪有坚持做“庄”总不开“和”的呢?只要有耐心,有毅力,别放弃,坐得住,中途不打退堂鼓,咬紧牙关坚持搓下去,那么早晚有一天会有开“和”赢牌的时候。(《含情脉脉水悠悠》)

用“麻将”来为“文坛”作喻看似荒唐却意味深远。“麻将”的“娱乐性”、“消遣性”使得文坛附上了荒诞性。这荒诞不仅解构了“文坛”的语义,还解构了文坛的性质。作者在解构“文坛”的同时在小说中重构了一套麻将话语,使得麻将术语遍布小说文本之中,形成了小说语言语体杂糅现象。

又如:

那时候,这座城市的大马路和小胡同里,各种各样的艺术家像灰尘一般一粒粒地漂浮着。1985年夏末的局面就是城市上空艺术家密布成灾。他们严重妨碍了冷热空气的基本对流,使那个夏季滴水未落。(《先锋》)

“漂浮”、“成灾”成了“艺术家”与“灰尘”的相似点。而这相似点,是作者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群起的“艺术家”的独特理解。

徐坤小说语言变异比比皆是。按照常规,语言的运用必须合乎语音、语义、语法规则,同时还必须合乎情理。然而语言变异却打破常理、规范,出现超常的用法。这种“超常”的语言运用,使小说文本语境呈现出极度的不平衡,即出现语境差。如何对“超常”与“语境差”进行审美解读,这离不开对小说创作的语境分析。

二、小说语言变异的文本语境差

文本语境是小说语言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语言变异由于突破语言常规,这必然导致语境各因素之间的不协调。我们在阅读徐坤的小说时,发现其小说语境呈现明显的语境差,主要表现在时空语境、语体语境及上下文语境上。

1. 时空语境差

整体来看,小说语言必须与特定的时空语境相适应,才能在文本内形成协调一致的时空语境。但是小说家为了追求特定的效果,往往会打破文本内时空的平衡。徐坤的小说中不与时空相适应的语词频频出现,这是形成其小说时空语境差的重要原因。例如:

如来佛主一听,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说你们几个呆和尚!如今这世上,哪有白白传经的?各文化事业单位国家都已不再拨款养活了,经费都要靠自己创收,自负盈亏,你说我们传这点经容易吗?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空取。你们空手套白狼,连一点小费都不肯出,所以传给你们一些白本那也怨不得别人。”(《行者妩媚》)

上面这段话是如来佛主对唐僧等人说的。可是,在一千多年前的故事人物口中却出现了“文化事业单位”、“拨款”、“经费”、“创收”、“小费”等一系列现代词汇。在这种超常规的语词的选用中,我们分明感觉到了小说中时空语境的不协调。如来传经、和尚取经这本是庄严、神圣的事情,现如今却与经济挂钩,不给“小费”不传予真经,这实在是荒唐之极。然而,透过这荒唐,我们清楚地感觉到了作者对现今文风的辛辣讽刺。

徐坤小说中,语言变异形成时空语境差的例子还很多。例如,《热狗》中,主人公陈维高的小舅子不动嘴里就蹦出文革时期的话语;《梵歌》中,武则天也能操着现今的口吻说话;《竞选州长》中,约翰张的话语中也总能出现中国词汇……时空语境的平衡,在徐坤小说中完全被打破了。

2. 语体语境差

“每种语体都有各自固定服务的对象和任务,并有自己的语言特性。但彼此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3]。语体间的相互渗透是语言交际的正常现象,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尤为明显。文学作品中将不同的语体交叉混合在一起,会形成语体风格的不协调,造成语体语境差。

徐坤小说语体杂糅的现象很突出。她的小说融入了散文、诗歌、思想时评、足球评论、麻将话语等非小说语体,因此,其小说的语体语境不协调随处可见。如:

《中华大百科全书·文艺卷·F类》:

F: 废; 废都; 废墟; 废墟画派: 崛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代表人物: 撒旦、鸡皮、鸭皮、屁特。代表作: 《存在》, 《我的红卫兵时代》, 《人或者牛》, 《行走》。影响或者贡献: 唱念做打俱佳, 呈前卫状, 做先锋科。在纯洁绘画语言方面开创了我国后现代艺术的先河。(《先锋》)

这段话是对先锋画家出场的描述,作者却巧妙地运用了辞书语体,同时混用了体育用语(“前卫”)、艺术用语(“先锋”、“后现代”)以及戏剧用语(“唱念做打”、“科”)。不同语体杂糅交叉,使得这段话中的语体语境差表现得异常明显。然而,这绝不是作家漫无目的的恶搞。作者是在戏谑并消解了大百科全书的严肃话语中,否定了先锋画家的艺术实力。

3. 上下文语境差

上下文是构成语境的一个显性的重要因素,语句与语句的衔接关联构成了上下文语境^[4]。徐坤小说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等方面的变异,造成了其小说文本不同表现形式的上下文语境差。

《先锋》中的这样一则对话:

记者:“请谈谈当‘先锋’的感觉……”

撒旦:“我傻蛋连撒旦都当了,还在乎当个先锋吗?”

记者穷追不舍:“不要这么简约,请再具体说说。”

撒旦:“已经再具体不过了。先锋就是存在,就是我的红卫兵时代,就是人或者牛,就是行走。”

鸡皮:“先锋就是进口超重低音音响,可解 CD 唱盘,卡拉 OK 功能完美齐全。”

鸭皮:“先锋就是国产特效消炎药,头孢氨苄特糖衣片, I 号 II 号 III 号 IV 号 V 号 VI 号,败火去痰。”

这段对话通过对“先锋”的超常比喻,对“先锋”这一词汇意义进行消解。“先锋”的原义是指行军或作战时的先遣将领或先头部队,后来用来比喻在事业中起先头引导作用的人或集体。当“先锋”从撒旦、鸡皮等先锋画家口中说出来,已经完全脱离了本义,已经可以不再指人,而可以指牛、行走、药品等任何事物或行为。这种用法完全脱离了“先锋”的词义范畴。这是表现在上下文词汇意义方面的语境差。

在徐坤小说中,还存在上下文语法方面的语境差,如:

现在我总算是看明白了,有钱能使鬼推磨,什么一流歌星二流歌星的,再艺术,只要到了我这块地面上,都得听我摆弄,被我榆木墩经济来经济去的。(《先锋》)

“艺术”原本是名词,可在榆木墩嘴里却成了形容词;“经济”本来是名词,从他嘴里出来也成了动词。这是突破语法规则的超常规用法,形成上下文语法方面的语境差。榆木墩原本是先锋画家的成员,后来一脱胎成了“经纪人”,作者借“艺术”和“经济人”的超常规运用,讽刺的意味便显而易见了。

三、小说语言变异的文本外语境

文本外语境是小说语言变异的重要语境因素,它既是小说语言变异形成的推动力,更是造就小说语言变异特征的关键因素。徐坤小说语言变异的文本外语境主要有两个:一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二是作家自身的女性、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

1. 社会文化语境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话语特征,这是由每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决定的。

徐坤的写作开始于 1993 年。20 世纪末的中国,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形成了文化混杂的局面,其显著特点就是大众文化畸形地膨胀,文学的“消费性”逐渐取代了文学审美性。“文学在很大强度上成为消费社会的一部分,它从生产到传播到阅读都消费化了,人们以从未有过的轻松自如的方式阅读文学作品”^[5]。于是,小说要想成功就得取悦“大众”、满足“大众”享乐的消费心理,作家也随之拼命追求文学的游戏功能,以此来增强作品的阅读快感,从而赢得“大众”,赢得市场。

然而,在某些作家迎合大众消费的同时,也有些知识分子进入了“失语”的状态。因为失语,也因为消费文化的盛行,知识分子一时间由 80 年代的中心地位退居社会边缘,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失语也是精英身份的失去。

在短暂的失语过后,知识分子又纷纷重整旗鼓企图找回失去的精英身份。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却以媚俗的姿态迎合大众、讨好大众,又从西方大量进口各种“主义”。结果,这种慌乱的寻找不但没能为他们找回原有的身份,却反而使他们在盲目中迷失。

徐坤见证了知识分子的由盛转衰的发展历程:80 年代的高速发展,90 年代的“失语”和挣扎。同

时,在见证了知识分子80年代的光荣后,作为文坛的未来,她是满怀希望地走进90年代,但是,现实使她的理想破灭了。徐坤跟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遭受着无法超越现实的痛苦。在这样的痛苦面前,徐坤需要言说,需要宣泄,她选择先将知识分子的存在荒诞放大到极致,然后再消而解之的处理方式。所以,徐坤采用了荒诞、调侃的语言方式来书写知识分子无奈的心态,从而来表达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与警醒。如:

接着来的就是小说家,小说家的事业是人类□□工程师的事业。小说家一手拿着泥抹子,一手拎着水泥桶,把12345678个阿拉伯数目字儿一层层地往起码。码完了,还剩一个9,9自手。一条龙上停,推倒,和了。自己连喝几声彩,用帽子转圈向围观者收了那么十几张票子,点了点,还略有个小赚,不由得心满意足。(《先锋》)

2. 知识分子和女性双重身份语境

“变异作为一种特别的言语表现方法,始终与作家的精神气质(美学情趣、社会阅历、生活方式、文化环境、艺术素养、语言技巧等)紧密相连”^⑩。例如,老舍喜欢用群众语言,加上他自身对北京方言的熟悉,他的语言中大量吸收了北京土语,形成具有北京方言特色的词汇变异;刘索拉把音乐语言融入小说语言系统中,是因为她不仅是个作家,还是个作曲家。徐坤小说语言变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受其女性、知识分子双重身份影响的。

(1) 女性身份语境

徐坤有“女王朔”之称,是因为两者在语言上的相似性,即都喜欢“侃”,但这种“侃”,还是有差异的。如果说王朔的“侃”是大俗,那么徐坤的“侃”则大俗中有大雅,这是受其女性身份影响的结果。

“女性”作为一个词语是与“男性”在同一语义层次上的,但作为社会的主体,“女性”与“男性”似乎很难达到地位的平等。在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社会中,女性往往处于一种从属地位,或处于“缺席”状态,或处于“失语”状态。这样的社会中,女性要赢得一份话语权力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徐坤在创作之初选择了一种“僭越性别”的语言,即运用男性话语——这一社会中心话语来书写,以此来引起世人的关注,为自己赢得一份话语权。如《游行》中的一段话:

妈妈是个广场,爸爸是个旗杆子,若问我们是什么,红旗下的蛋……我爷爷那会儿人爱造神,我爸爸这会儿人会造人,我们都是可怜的试管婴儿,也不知道精卵都他妈的是谁的……

这样荒诞的比喻下面是粗俗的口语化语言。这样粗俗的语言原本只能出自男性作家之口,但徐坤却肆无忌惮地选用了。徐坤正是以这样的语言风格来叙写男性的内心世界及处境,从而达到批判男权中心社会的目的。

女性是充满诗意的,具有细腻的情感和诗情品格。这在小说语言上的表现就是语言的诗化。徐坤小说语言中大量融入了诗化的语言,这是其语言变异“雅”的重要表现。小说《从此越来越明亮》是徐坤小说语言诗化的典型。小说的前三章都以抒情诗开头:

每一个女人都在精心守护着自己的紫禁城,
哪一尊帝王把她从昏厥的炼狱中高度提升?(第一章的“紫禁城”)
我看见
春天的紫禁城里满怀千种的欲望奔腾翻涌(第二章的“紫禁城”)
你所期冀的欢欣已来临
你却在你的高潮之上无端崩溃(第三章的“紫禁城”)

小说的章首引用的这些抒情诗是为烘托小说整体的抒情基调设置的。“紫禁城”作为一种隐喻,隐喻内容的不断变换预示着女性社会地位的不断转变,在隐喻中却显示出了诗意化的语言风格。徐坤小说语言的诗意化、感觉化是其小说语言“大雅”之所在,与“侃”的“大俗”形成鲜明的反差。因此,徐坤小说语言变异具有“大俗”与“大雅”的双重特质。

(2)知识分子身份语境

徐坤是知识分子,更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这样的身份又赋予其小说语言变异别样的风貌。

首先,徐坤是外国文学硕士。1992年,她硕士研究生毕业,而她的小说创作开始于1993年,这就说明,在创作阶段,徐坤已经谙熟外国文学及文化。徐坤经常把外国思想文化用语以一种变异的姿态搬进小说当中,来达到讽喻国内种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目的,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特有的机智和批评力度。如:

江浙一带的小帅哥才子们的破破烂烂的童年回忆录里,已经可以榨挤出不少“伊狗”“里比多”“杀父娶母”意识了,要赶紧组织评论,加以疏通、引导、光大,说晚了就赶不上世界新潮了。(《游行》)

上文中的“伊狗”、“里比多”、“杀父娶母”具有深厚的西方思想文化背景。徐坤把它们融进小说当中,主要是对中国知识分子赶潮流、盲目崇洋媚外的有力讽刺,使得这三个词语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那些丧失民族思想主体性的“知识小贩”的代名词。而这一切都是徐坤对知识分子独立文化品格的自觉维护和召唤。

其次,作为知识分子的徐坤,在熟稔外国文学的同时,其中国文化底蕴也是相当深厚的。她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研究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同时,还在中国社科院取得了文学博士学位。徐坤自身文化积淀之深厚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其小说语言的变异也形成了一套独具民族色彩的“知识分子话语”,其主要特征是成语的大量运用,古典诗句的大量引用和化用。

可以说,社会文化及双重身份影响是徐坤小说语言变异的重要文本外语境因素,它们赋予了徐坤小说语言变异以别样的特征。

参考文献:

- [1]冯广义.语境适应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 [2]徐国珍.仿拟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 [3]王勤.汉语修辞通论[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
- [4]祝敏青.小说辞章学[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
- [5]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 [6]冯广义.变异修辞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Contextual Analysis of Language Variation of Xu Kun's Novel

Chen Bilian, Wang Bingzhong

(Concord University Colleg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17, China)

Abstract: Xu Kun's novel language variation has injected vigor into literary language, and expanded the tension of literary language. On one hand, this kind of literary language variation influenced by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in the 1990s, on the other hand, the language variation is due to the writer's double identity which has women and intellectual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text" and "text context" of Xu Kun's novels, we can analyze the unique literary connotation of the language variation.

Key words: Xu Kun; literary language; language variation; context; literary connotation

(责任编辑 王作)